

目 录

林克武题词

前言

陆川沿革史.....地名办公室（1）

陆川青年革命历史片断.....罗培元（2）

智勇双全 威震八桂

—— 宁培英烈上传略.....何炳芬（32）

陆川青年有志气 万里从戎赴延安.....丘日慰（48）

吕清夷先生传.....周克邦（49）

林虎传.....刘开基（52）

我所知道的廖磊

.....廖瑞珍口述何德唐整理（65）

我所知道的吕集义先生

.....吕 梁（74）

桂系统治广西时期的陆川社会缩影

.....谢华文（85）

陆川历史人物诗选（连载之一）

.....刘开基（88）

陆川的人情风俗.....陈科新（91）

难忘的回忆.....陈科新（93）

陆川县沿革史 ·地名办·

陆川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地处东经 $110^{\circ}04'$ 至 $110^{\circ}24'$ ，北纬 $21^{\circ}53'$ 至 $22^{\circ}36'$ 之间。东北与北流县接壤，东南与广东省化州、廉江县交界，西南与博白县相连，西北与玉林市为邻。辖陆城、马坡、乌石、良田四镇及温泉、米场、平乐、沙坡、大桥、清湖、古城7乡；共5个街委会，155个村委会。人口582528（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汉族占98.79%，余为外地迁入的壮、瑶、仫佬、苗、黎、侗、布依、毛难、彝、回、藏、水傣等16个少数民族共7055人。县南讲客家话，县北多说粤语方言。县人民政府驻陆城镇，西北距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300公里多，南距广东省湛江市126公里。

陆川县历史悠久，先秦以前为百越地，秦，始皇平定南越置三郡，属象郡。汉，文帝平赵沱置九郡，属合浦县。三国，先属蜀后属吴；直至晋，均为交州合浦郡合浦县地。南北朝，宗始置陆川郡，后省隶属合浦郡合浦县；齐复置陆川郡；梁、陈间废陆川郡为陆川县。隋，初因旧制，大业初省入勾漏县（今之北流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后置陆川县，县治设于公平，（今北流县境内）初属东莪州，后属容州；大历年间（776—779年）容经略史报将陆川县境析置温水、龙豪、龙化、南河四县，陆川属禺州，余四县属顺州。王代为容管辖地。宋，开宝五年（972年）废顺州的温水等四县入陆川县，属容州；淳化五年（994年）县治迁温水县治（即今之陆城镇）。元属容州路。明属梧州府。清，初沿

之，雍正之年（1725年）复属鬱林直隸州。民国，初属梧州道；22年（1933年）改为梧州地区；26年（1937年）属鬱林区；31年（1942年）夏改属梧州区；33年（1944年）再属鬱林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因旧制，1951年春属容县地区。1954年增辖原博白县车田乡之车田、旺垌、竹山三村。1958年改属玉林地区至今。

全县总面积1551平方公里。地形南北狭长，东西宽32公里，南北长105公里。属桂东南丘陵山区，系云开大山系的勾漏山余脉，东北从北流县入境，经沙坡乡至县中部，分东西两支，呈南北走向，因此，较高山岭多分部于中部东西两侧。东西有茂岭、谢山嶂、天子印等，西侧有沙湖嶂、辣篱嶂、黄蜂笼等，最高谢仙嶂海拔792米。从而构成东西两侧高。地势均向中线倾斜，南北低的狭谷走廊地形。且最高谢仙嶂位于中部，县北靠玉林盆地边缘，地势开阔平坦，县南界广东省廉江县地势较低，盘龙街最低点仅海拔30米，又形成中部高，南北低的拱背形地势。因此境内河流多发源于中部，四向分流。主要河流有九洲江、米马河、榕江、低阳河、清湖河、沙湖河。分别南流至广东省廉江县安铺入海，西北流至玉林、博白县汇南流江入海、北流至北流县汇圭江入珠江。由于这六条河川源出于境内，向外分流，故得名陆川。

（转载） 陆川青年革命历史片断

罗培元

一、二十年代大革命风暴对陆川青年的影响

2

陆川是一个穷县，山多人多耕地少，因为生活困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行，外出谋生的人不少，有好些人还被当猪仔卖去南洋做苦工。土匪很多，政局动荡，青年急进思变，是传统现象。本世纪二十年代，闭塞的陆川，交通略有发展，可以从大桥坐木帆船经石角、安铺出广州湾，再经水东到广州、香港等地，陆川的大米和生猪都是名产，可以运往广州、香港出售；特别是玉陆公路通车以后，又可以从陆上经梧州，再坐船到广州、香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商品慢慢渗入陆川，山区锁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进一步解体。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输入了现代文化。这些所谓现代文化，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西方的耶苏基督教教义，二十年代中后期，乌石街上已有通俗的《新约》、《旧约》和圣母、耶苏像等出售，还有天主教堂，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前哨工具；（2）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的书籍、报刊相继流入，那时白话文写的课本代替了历代用的“子曰诗云”和中华民国初期的“国文”课本，自然科学课本已有数学和声、光、化、电的内容，私塾也已经改为国民学校，逢年过节，街上也有些所谓“新派”的东西出售，如改良的四季青年画、摩登女郎年画、四季景色挂画等；（3）“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书籍刊物也传到了陆川，陆川青年很快接触和传播了这些新思想，从此，陆川新时代的幼芽在生长。这是陆川社会在前进的大事，当时往往给人们忽视了，事后才充分感觉到这一点。

这些所谓现代文化，对陆川来说，都是新的东西，它象潮水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陆川的旧文化展开了程度不同的

冲刷和斗争。青年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激荡着、分化着，有的前进，有的动摇，有的后退。前进的，无论什么样的革新，对他们都有吸引力，都想读想看，如饥似渴的去寻求、吸取，极力排斥旧文化，要求变革社会；后退的，感到幻灭，也有人走到了反动没落的道路上去。当然，更多的是动摇，感到无所适从的徬徨、苦闷，最后是向左右两极分化。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大革命高潮影响下，曾一度觉醒，但不久又沉睡起来。这时的陆川，新社会才在孕育着，新与旧，半新与半旧交织着一幅合乎逻辑的有史转折的画景；对于青年界，也出现了大浪淘沙的局面。

约于一九二五或二六年，我在坡山村詹庄小学读书，有一位老师叫罗英福的，他从陆川中学辍学回来，到我们的学校任教。他的教法和那些冬烘先生（旧式教师）完全不同，桌上没有戒尺，手上不拿鞭，对着学生，总是满面笑容的。他一开始上课，既不讲“人之初”，也不讲“狗，大狗，小狗”，却在黑板上写“阶级斗争”四个大字，他竟不看对象（我们都是十岁左右的毛孩子），不顾环境，滔滔不绝地宣传起马列主义来，他以演说人的姿态和腔调对我们说：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有穷人阶级，也有有钱人阶级，穷人借了富人的钱没得还，就要被拉猪拉牛，世世代代受有钱佬压迫、剥削……等等。我们当时听了、觉得很新鲜，闻所未闻；后来他讲了马克思、列宁学说，也讲孙中山的主张，说穷人要起来和富人斗争，要打倒地主，分田分地，打倒土豪劣绅，他还说要反对家长的封建统治。看来，这些话，在当时有点“对牛弹琴”，但他确是反映了当时陆川青年激进的思想潮流。老实说，我自己当时也不懂得多少，只是后来越

接触生活，越相信这些话是对的。所以，也可以说，我接受马列主义，就是从黑板上看到“阶级斗争”四个大字开始的。我想，象我同时感觉到罗英福上述影响的一些同学，不只是一人，据我所记得起来的，该校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学生，还有罗祯元、罗耿元、罗福兴、罗阿狂（浑名）和罗聪元（毓权）等。

广州大革命风暴，北伐战争的浪潮波及到陆川，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每逢“五四”纪念日或国耻纪念日，乌石附近各校的学生都吹喇叭、打铜鼓、举着红布白字或白布红字的校旗，穿着统一的白衣服，上街游行，当时青年学生中知道要搞这些行动的道理的人很少，我们觉得这样干不象旧时，很新鲜，很高兴。陆川中南部的沙井堡附近一带的学生尚且如此活跃，陆川中学所在地的县城里的学生的活动可想而知。在沙井堡附近一带的学生开纪念会，都是集中在乌石圩，大会场是在牛圩坡。开会时，新派青年领导人物有的是陆川中学来的，有的是小学教师，都登上临时搭盖的木棚上发表演讲，据我所知，那时罗英福、罗英寿、罗梓元等都是学生的领袖人物，许多场合的公开演说，都有他们。由于当时还没有现代扩音设备，只用个洋铁皮做的扩声器，稍为远一点的人都听不到演讲人讲的是什么。演说后，又是游行一番，全街为之轰动，还开运动会举行蓝球比赛。因玩蓝球是新玩艺，学生们和趁圩的人围观如堵。那些新派急进人物往往就在这时候去城隍庙打菩萨，向鬼神宣战，菩萨不是给打得粉碎，就是头破肢断，有的人拿着一些菩萨的残肢破头去游街，表示勇敢和胜利，这是对神权是一种有力的冲击；集会期间的各个晚上，各校轮流演白话戏，内容多数是宣传北

伐战争、反对军阀，打土豪、反对家长专制、反对包办婚姻等，这些活动都给广大青年学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虽然学生群中也有不以为然的、反对的，但进步的思想潮流始终是占上风的。从县城中学来的进步学生在这当儿，就难免趾高气扬，扛着童子军棍，就俨然象是扛起了犀利的枪枝随时可用以对付反动派那样，走路也是雄赳赳的。

以前的学生是“十年寒窗”，现在不同了，每逢星期天或者节日、圩日，总想上街去看看有什么新闻，有什么新的东西；青年中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学生剪辫子、争取上学机会的空气甚为浓厚；敢于当街大骂土豪劣绅的，也大有其人。当时流传着国民革命军歌，歌词中的一叠是“

“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大家奋斗到底，大家奋斗到底，必成功！必成功！”其余二、三叠的下阙有的词略有不同，曲子则是一样的。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正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时候。当时也有些国民革命军的部队穿着崭新的灰布中山装经过陆川（听说张发奎也曾带队经过陆川），而遇上这样的机会，一方面，是有些青年应招去当兵，我的胞兄罗坤元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士绅就施展活动，请那些佩带着精神带、骑马过市的军官大吃大喝，一些所谓“国民革命”军官，就这样和地方的土豪劣绅勾搭上，并且杯酒言欢起来了。

大革命时代，我党毛泽东同志等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成立农民协会、二五减租为号召的农民运动的风潮吹到陆川，广大农民听了如大梦初醒，有所响应，但不甚热烈。成立农民协会，倒是普遍的，在乌石的牛圩坡也开过几次有附近各乡农民手拿三角彩色纸旗（旗上写些当时农民运

动流行的口号)列队参加的农民大会，也有人在会上演说，因为人太多，成千上万的，闹哄哄的，我们小学生只在旁边看，听不到主席台上的人讲什么。由于当时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没有同农民大众结合好，成立农会这样的大事多数是给地、富分子所掌握了，我家所在那个村(现叫蒙村大队)的农民协会就是由我的伯父罗虞林所掌握，他当时虽也只是个小学教员，还没做到乡绅，但思想落后，是听地主阶级的话的。他也召集农民到一些祠堂或神庙开会，照例摇铃宣布开会演说一通，也叫二五减租、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煞有其事，却没有那个农民发言响应，临末却宣布成立了农会，并“通过”由罗虞林任会长了。二五减租是假，地富掌握农会是真。贫困和走投无路的农民，出路何在呢？胆小的仍忍饥挨饿，胆子大的参加土匪活动、绑富有地主勒索的事，打劫地主家的事却不少，有的是白日打劫、绑架，官军一来，不是散了伙就是躲进粤桂边境的十万大山，官军乡团对他们毫无办法。十万大山的土匪武装有许多股，他们只是迫于生计和官军清剿而上山，没有什么政治觉悟，更没有先进的组织领导，所以走上农民运动的革命道路的却没有，这是青年学生运动还未和广大贫苦农民的反影，也是二十年代陆川青年革命运动的一个基本缺陷。至于陆川小商人的抗税运动，随着小商业者的日益增多，处境又不佳，急进的青年号召的抗税斗争(口号是打倒苛捐杂税)，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例如，大抵是二十年代中，政府和土豪劣绅为了加强剥削，在乌石牛圩坡上设立了一个税务机构，好象是叫做陆南税厂，房子和办公一应所需都筹备好了，正准备择吉开张，而在开张的前一晚，却有人在税厂门额贴上

“当大事”（死人办丧事的意思）的大幅的白纸黑字，税厂开张之日，正好是圩日，赶圩的很多人都看见了，反动派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只好叫人撕掉。但后来许多人议论开了，都说：税务局选了好日子，才想第二天开张，局长却在当晚死了。后来还听说，以当时陆川中学学生为主体的陆川学生联合会动员了其他一些小学校，成群结队的自陆城南下到乌石，对增设税厂示威抗议，这真是打响了抗税斗争的第一炮。但也是由于陆川青年运动和广大农民以及小商小贩没有结合好的缘故，抗税斗争只取得暂时的胜利，却始终没有开展得起来，并持续下去。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广州起义也失败了，这退兵的一战影响所及，在广西有左右江的农民起义与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这个斗争震动全省，但玉林地区的斗争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我们当时只听到乡下广泛的流行着共产党员博白人朱锡昂，领导青年学生和农民斗争失败，朱本人被捕，英勇就义，成为玉林地区著名革命烈士的传说。这些传说，使玉林一带地主豪绅闻而胆战心惊，却鼓舞着无数的革命继起者。陆川进步青年，私下谈起朱锡昂，无不肃然起敬。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遍及全国，陆川也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在当时所谓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的进步的陆川青年，多数跑到上海念书（因当时军阀割据，上海又有租界，地方小官不能轻易到那里捕人），少数跑到香港去了，陆川也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一些进步的陆川青年学生在陆川站不住了，也跑到外地——主要是上海——读书或干别的什么去了。但这些逃难离乡的进步青年，在文化较发达的上海，很容易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接触了许多

进步书刊，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他们把所能弄到手的革命书刊，用公开的邮递或秘密的传带方式寄给陆川的亲友。他们中有的回陆川当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宣传马列主义，从事地下组织活动。陆川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的学生运动，又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约于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我还在坡脚敦本小学读书的时候，我的堂兄罗梓元就给我看了陆川留沪学生会出版的会刊《顽皮子》，这刊物封面画有一个肥肥胖胖的、大眼睛的、神色十分顽皮的小孩子的头像，它令人一看就被吸引住了。有人说是陆川青年画家吕亚炎（炎森）画的，有人说是上海某大画家画的。《顽皮子》中有许多讲政治革命道理的文章，但最吸引人的是直接攻击县里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抨击县里反动校长的文章。影响很大给人印象很深的是署名羽羊（吕习义——即吕集义——名字的上半部），抨击吕俊逸的文章，吕俊逸——是当时县教育局长，地主阶级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任用一个叫做宁康的女人做女小校长，吕、宁互相勾结，压制青年，特别是压制女青年学生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解放思想与行动，引起女小、陆中和陆川留沪学生的强烈反对。吕集义的文章绘影绘声的描绘了吕、宁勾结的黑幕，又集中的喊出了陆川青年群众的呼声。

当时可能是有几个在上海读书的进步青年病死了或牺牲了，《顽皮子》上面刊有这样一首挽联：

“死本不足悲，际此大陆沉沦，汝曹安可死？

生又有可益，丁兹狂澜未挽，我辈枉偷生！”

这首挽联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它既有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思想和伤感，又有激进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慷慨悲歌

的仁人志士气概。它有如一首革命的挽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陆川革命青年在革命低潮时对白色恐怖的悲忿，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情緒。

《顽皮子》的主张概括起来有四个：（1）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2）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迷信、反对宗法制度、反对家长统治；（3）反对旧式教育，提倡新式教育；（4）主张男女平等，男女同校，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提倡婚姻自由。这份刊物在当时的陆川青年中不胫而走，是有相当广大的影响的。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三十年代初期由合平青年会出版的地下油印刊物《合平青年》、《什锦报》，更远一些的后果是陆川青年学生在广州出版的《陆川呼声》。

一九二八年至三〇年间，从陆川中学到一小、三小和沙井堡坡脚村敦本小学校，都有好些带有新思想和不满现实的青少年学生，传阅着上海出版的《儿童世界》、《新少年》等新派书刊及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蒋光赤等人办的创造社的《创造月刊》，和鲁迅的作品。那时敦本小学已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第一任会长是罗子荣，第二任会长是罗培元，我们当时出了在校内做些幼稚的学生自治性质的活动，引导同学逐渐走上择师运动之外，给同学们特别是进步同学影响较大和较深远的是和附近各校进行联系，组织各种纪念活动等。当时每年“五四”纪念日，以及其他国耻纪念日，乌石第三小学都是一个活动中心，每当这些较大的纪念日到来，附近各高级小学几乎都是倾巢而出，下一年就从事上年干过的那些同类的活动，好象乐此不疲。受罪的又是城皇庙的菩萨。每逢“五四”集会，被迷信神鬼的人经过一年努力

又扶了起来，或用泥修复起来的菩萨，又难免一次头崩额破，手足伤残之“苦”。但反映各姓宗派势力的神主牌，放在宾兴馆里面，和地主武装保卫，谁也碰它不得。后来我们从这些事件中也受了教育，认识到我们所要推翻的封建势力，一方面它和神权、迷信力量一样，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要和它作长期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彻底推旧社会的统治，还要拿起枪杆子才行，只靠上街游行示威和童子军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总之，二十年代的陆川青年运动，在大革命的影响下，虽然在输入马列主义，播下革命种子，出现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使陆川革命和全国革命一样，走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以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由于没有，也来不及和广大农民结合，没有抓住枪杆子，它不可能形成坚实可靠的革命势力。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一来，就抵挡不住，一些原先是很革命的青年被吓坏了，变得不革命了，甚至走上反动的道路，投靠国民党去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坚持下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能对前人过份要求的。

二、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陆川青年运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事变在陆川青年中引起了很大震动。最为敏感是青年学生，他们感到国亡无日，担心做亡国奴；广大农民也知道有这件事，但不懂得怎么办；也有人认为东三省离我们还很远，日本国小，政府又有这么多军队，不一定打到我们这个地方；也有议论日本有飞

机大炮和兵舰，要来也容易的。后来发生了“北海事件”，一个日本领事馆的人员或浪人在那儿为非作歹，被群众殴打或打死，国民党反动派反而出面帮助日本。这件事使人民对国民党大失所望，后来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把领导抗日斗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共产党，种因是深远的。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乌石办了一间南平中学，这里面有少数进步教师在启蒙学生走上革命道路。随着“九·一八”事件的发生，全国青年学生的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玉林整个地区的青年学生抗日救国呼声也高涨了起来。那时，玉林高中派学生下乡宣传抗日，有一个宣传队来到南平中学，我们南平中学的师生，积极协助他们上街宣传，虽然他们讲的多是外乡话，听懂的人不多，但他们穿灰布中山装，还挂上军官才能挂的“精神带”，哄动全街，宣传队所到之处，就给群众围起来观看，虽然话不好懂，“要抗日要救亡”这个口号，却深入人心。不久南平中学也组织了许多抗日宣传队到附近农村、学校、圩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我们也排演了话剧，宣传抗日，教师吕炎森是艺术宣传的得力领头人，他给学生们导演了教沫若、田汉、洪深编的许多新派话剧，他还亲自编导了一出叫“生番抗日”的剧让我们演出，刘毓华就是演生番的一个人。吕炎森老师还长于绘画，他画了许多宣传抗日的图画让我们张贴在交通要道进行宣传。由于他画的是很少人看过的水彩画，颇吸引观众。我们还组织学生队伍上乌石街检查日货，当时有几间“丝行铺”（即卖中外布匹的百货店）所有的日本货，都给我们贴封条封住了。店员十分支持我们这个行动，店主有的忍痛赞成，也讲些今后要抵制日货的话，有的背后表示不满，但在群众

抗日高涨之下，没有敢反抗的，宣传抗日的学生讲了算。

那时南平中学的校长是罗福康。因为他大革命时曾从事过革命活动，一度被视为革命青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跑去上海政法大学读书，经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诱，不讲革命了，有钱就到“大世界”玩，脱离了革命的青年群众。他毕业回来后，去应广西省府的县长考试，虽得个第一名，但因后台不过硬，只给派往广西最偏僻的“绥绿”县当县长，不久县长做不成，丢官家居，但他却不甘寂寞，要做坡脚祠堂里和所谓族头族绅罗霭柳这些反动头子混在一起，白天穿洋服修族谱，大吃大喝，晚上打麻将。罗福康这样做，大为一些革命青年所不满，有人写了一篇名为《衰落（谐绥绿音）县长修族谱》的文章，刊在《顽皮子》上抨击他，这对于那些堕落的“革命”青年是当头一棒，也给动摇、彷徨的人们一服清醒剂。当然，当年抨击过罗福康，后来也走上了罗福康道路的也大有人在，但这是另一回事了。罗福康到南平中学做校长后，虽然也主张抗日，也请了一两位进步老师如罗英寿、吕炎森（都是共产党员）等，做过些好事。但他基本上倒向地主阶级一边，想利用办学校重振做官旗鼓，“衰落”精神不变。他象上宾般接待了从梧州牢房自首变节出来的人不算，还把其人写的一篇丧尽革命青年气节，低首下决心向反动当局要求增加囚犯口粮的旧体文章，抄给师生传读，流毒不浅；罗福康对罗英寿、吕炎森这些进步教师，却一再设置障碍，要他们自动离校。所以当时进步的老师和学生对罗福康很不满，特别是进步教师吕炎森曾公开反对过罗福康，后来遭到罗的打击，吕气不过，罢教回家。为了跟罗福康作斗争，我们曾抓到他每晚出街打麻将到深夜才回来的弱点，

在学生中制造舆论，对他施加压力，要他，让进步的老师回来。但有一些学生竟利用罗福康去县城开会之机，也在校内打起麻将来，有几晚，膳堂的饭桌都成了“四方城”，骰拍声不绝，校外也听得见。这一来社会上都讲开了，指责南平中学校风不好。罗福康从县城回校，马上就知道了，他盛怒之下，要开除几个学生，我们几个没有参与打牌的同学被当作学生代表去和罗福康谈判，要他不要开除学生，他坚持原来主张，我们就公开揭发他身为校长，每晚到外地打麻将，深夜才回，我们耳闻目睹，质问他有何理由开除学他样子的学生？我们还揭露他迫害进步老师，败坏学校风气的言行，使他十分狼狈，哑口无言。他终于答应不开除学生的要求，从此也不敢明目张胆到街上打麻将了。由于我们这个反开除的斗争取得胜利，加上罗福康让我们去请被他迫走的吕炎森回来的斗争的胜利，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但由于胜利来得太容易，也冲昏了我们的头脑，在以后的一些不经过周密思考的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一味盲动的斗争，招来了失败。例如，一九三二年秋，或一九三三年春，徐为梁继罗福康当校长，徐虽出身地主家庭，政治上却是个中间分子。上任后留任了进步教师，教师发不了薪还从家里拿钱来补贴。只因他少爷习气重些，对进步学生没联系，他一上任开学，便出布告，限令学生依期交费，这本来是旧时学校中很平常的事情，但因为我们已有了一种“天然”的对抗思想，几个进步学生（刘毓华、李祖焕、肖相豪、罗耿元、罗培元等）商量之后，决定鼓动全校学生不交学费，几个人带头不交，想掀起全校反对新校长的风潮。刘毓华还撕毁了校长布告，徐为梁为了挽回面子，坚持要开除刘毓华。后来因为我

们的行动脱离群众，斗争搞不起来，进步教师也叫刘写个检讨妥协，交费上课了事。

那时抗日运动波动面很宽，行动声势很大，逐渐发展到秘密结社并同农民相结合。我们在南平中学一些进步的学生在罗英寿的领导下，建立了读书会的组织，参加读书会的有罗耿元、李祖焕、肖相豪、刘毓华、陈振权、王廷机和罗培元等。当时我们读的违禁书不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等。罗培元是读书会的召集人，上级领导是罗英寿，但上述这些书好象都是从王廷机、陈振权那里弄来的，他们两人是不大出面的人物，行动有点神秘，可能那时他们已是共产党员。我们活动的方式，多数是利用吃晚饭后到学校南面白社那地方，以散步为名，掩蔽着开会。开会前，有时是王廷机有时是陈振权给我们带来秘密传单、进步书报，读书会成员则轮流阅读，由于我们知识水平低，读时只是生吞活剥，讨论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只是感到书中所讲的道理新鲜，信了它可以革命，可以共产，可以救中国。罗英寿还给我们阅读过《合平青年报》《什锦报》等。我家眼见过王廷机躲躲闪闪的交有进步书刊给罗英寿，但读书会的活动情况，多数是由我向罗英寿汇报。当时先后向罗福康、徐为梁这些学校负责人以及冬烘先生吕茂香等人作斗争，也都是由我们读书会的人发动和出面带头。后来罗英寿介绍我加入合平青年会，同组的有王廷机、陈振权；刘毓华有无参加我记不起来了。因为合平青年会和读书会活动大体相同，只是前者算是更秘密一些，多搞了一些秘密传递传单和更加秘密的阅读书报罢了。记得

有一次罗英寿给我一份《红军捷报》，叫我十分秘密的看，只准给最信得过的读书会员传阅。该报是四开铅印的，头条新闻标题有“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湖南省会长沙震撼”，我们当时还不认识那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所以读报后十分兴奋，对我国革命前途充满了不切实际的速胜观点。

大概是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左右，林克武由一小转到三小读书，他是一个被叫作小学的“风潮头”的人物，在县城一小闹过“风潮”，到了三小不久，又“闹风潮”，当时陆川学生所闹的风潮，无非是反对旧式教学，反对落后老师压迫学生，选择进步教师要学校任命这类内容。由于这些斗争多数有地下党的领导，一校发动，别校进步学生则起来响应，表示支援，以壮声势，所以斗争往往越出一校范围，附近学校互相通气，配合行动。我们南平中学与三小只是一墙之隔，自然不能对三小的风潮袖手旁观，所以我们也发宣言支持三小，后来三小的斗争也取得胜利。

我们在南平中学的读书会还有一种革命行动，就是发革命传单。有几次的王廷机或陈振权秘密弄来了许多油印传单，分派给我们，叫我们晚上到各人邻近的乡村散发、张贴。这些传单大多数是用陆川农会的名义发出的，传单的内容多是向农民宣传抗租、抗税、抗高利贷的，也有宣传抗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反对内战的。我们读书会的成员接受任务后，晚上就分路出发去农村散发和张贴。第二天早上，还要装着无事一般，赶回学校上课。那时陈振权、肖相豪回大桥，罗培元、罗耿元回坡脚蒙村一带，刘毓华回月垌一带，李祖焕回滩面一带。因为是晚上去贴，不敢